

评小野寺史郎的《国旗·国歌·国庆》

丸田孝志

全球化在 21 世纪初的发展造成的国际竞争激化和现有社会构造的崩溃带给人们的不安情绪,催生了世界各地狭隘国族主义(nationalism)均趋高涨的状况。在此背景下,亦可见国旗、国歌、纪念日等国家象征(national symbol)已经成为在爱国的名义下将各种不满、不安情绪套入固定模式,并以此作为对外释放敌意的工具而使用的情形。在亚洲区域内部国族主义仍互相激烈冲突的今日,探究国家象征作为国族主义表达工具如何成立,对理解由历史所塑造的国族主义的原本形态,以及思考与现今国民国家关系密切的各种问题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

—

近代国家象征的研究,随着国民国家研究和社会史研究方法的盛行,不仅在西方史、日本史领域,在克服了革命史观并已将国民国家建设作为中心课题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也倍受关注。本书著者小野寺史郎是活跃于日本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思想史研究第一线的学者,其研究范围自清末至 20 世纪 50 年代,以通观中国近现代史的广阔视野和扎实的实证研究见长。《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原著『国旗·国歌·国庆——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シンボルの中国近代史』、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 年)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充实而成,以实证手法考察了近代中国的国家象征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对近代中国国族主义研究甚有裨益。

当下国际学术交流日益活跃,有关中国研究的最新日文著作不断被译介到中国国内,以国家象征为主题的本书,此次亦作为日本中国近代史学界颇具特色的成果被介绍到中国,这必将使两国学界有关国族主义研究的交流范围更加拓展,值得庆贺。另外,本书的译者周俊宇是正在日本留学的台湾年轻学者,他主要研究与国民政府和台湾的纪念日相关的问题,曾出版《党国与象征:中华民国国定节日的历史》(台北,“国史馆”2013 年版)一书。此书与本文所评小野寺著作关系密切,并且对其有所补充,还望读者一并参照。本译作的刊行也是日本、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学术交流有所进展的象征,而译者由该领域专家担任,也可谓甚得其人。

二

本书章节及概要如下:

序 章 国族主义研究与象征的历史学

第一部 清末、北京政府时期的象征与仪式

第一章 中国的首面国旗

第二章 国旗的论争

第三章 纪念革命

第四章 从国乐到国歌

第五章 共和国体与五色旗

第二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象征与仪式

第六章 国民革命与青天白日旗

第七章 党旗与国旗

第八章 国歌与国歌

第九章 历书上的“革命”

终章 从国家象征所见的中国近代史

序章论述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中国自与欧美各国接触后,即面临着迅速实现近代化的巨大压力。而国家、政党及知识分子对于“创造国族主义的仪式或象征”的重要性,极具自觉性。^①在这些仪式或象征中,本书尤其就代表国家本身的国旗、国歌及使用国旗、国歌的国家纪念日进行了分析。

著者以西方史、日本史等有关“仪式”“象征”的研究成果为据,主张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分析中国的国族主义。他特别介绍了梅里亚姆(Charles Edward Merriam)有关政治学象征研究的经典论述,指出利用“仪式”和“象征”的“大众国民化”进程中存在两种要素,即诉诸大众知性的“理性面支配”(Credenda)和诉诸大众情绪与情感的“感情面支配”(Miranda)。^②本书在讨论中华民国的国民统合原理及国家象征的操作时,就从共和及革命的理念,还有其与传统、民俗等的关系出发具体论述了以上两要素所处的地位。著者认为,因为近代国家皆遵循一定形式制定国家象征,故其可与同期或早先其他国家的状况作共时性比较。且国家象征问题自清末以来备受关注,故也可以长期视点分析其历时性变化,而通过这些手法可以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新的见解。另外,为弥补社会史研究往往偏于对问题作结构性把握的弱点,本书利用了政治史、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并将分析的重点置于说明象征被使用的具体政治环境、与此类象征紧密相关的权力以及知识分子等的认识及其主体性选择之上。

正文由两部分组成,分别论述了清末至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象征的成立及演变过程,文中并对各个时期象征本身的特征给予了关注。

作为国家间的交换仪式和军队仪仗而于清末引进的国旗、国歌,和新政时期引进的各种新兴仪式一起被应用于日常生活,并起到了整合国民的作用。

革命派为避免由主导权之争导致的内部分裂而未规定统一的国旗样式,因此辛亥革命时曾出现过各种“国旗”。通过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妥协,放弃了“排满”主张而成立的中华民国构建了为所有势力都接受的标榜“共和”与“文明”的象征体系。其采用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为国旗,并以继承清末追悼仪式的形式确定了国庆日。

但是,在北京政府内部,利用这些象征动员民众的意识非常淡薄,发挥该作用的主要是民间知

^① 小野寺史郎著,周俊宇译:《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② Charles Edward Merriam, *Political Power: Its Composition and Incidence* (Whittlesey House, 1934). 斎藤真·有賀弘記「政治權力—その構造と技術(上·下)」,東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

识分子和社会团体。五色旗在反对复辟运动中是“共和”的标志,而在民众运动中则是“爱国”的象征。因其意识形态上的中立性,直至北伐前夕,国民党的支持者中也有继续使用五色旗的。与此相对,在国歌的制定过程中却曾出现激烈的争论,其焦点问题是西方音乐要素的引进、歌词通俗性以及民族主义的唤醒等。

国民党成功地将已去世的孙中山塑造为“民族象征”,并通过北伐实现了国家象征在党国体制原则下的统一。与北京政府以代表民意的制度为其政权正当性依据相比,训政时期的国民党不得不将政权正当性归结于其作为前卫政党的革命性,并在向国民宣传时亦积极地利用了蕴含自身革命历史的象征符号。通过北伐及其后的宣传工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取代了作为国旗已被广泛认知的五色旗,但它实际上却是在左上方镶入国民党党旗图案的“国民党之旗”。此外,国歌也被党歌所取代——尽管曾引起各种争议,且令一些人感到难以接受。

纪念日体系是由国民党对其自身历史重新建构而创出的。在贯彻新历的政策下,国民党曾追求纪念日体系的序列化和单一化。为使象征更加庄严神圣,当局还曾制订一系列规定,以规范日常生活为目的进行了党员教育和民众的动员。

“终章”为全书总结部分,兼论中日战争时期及战后国家象征的转变^①,并得出结论。

立宪派和革命派在制订国家象征时都以实行共和制的美国及法国为模仿对象。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未特意将近代以前的共同体象征或集团归属意识应用于国家象征,比起诉诸情感的方式,他们更倾向于理性的说服。这种倾向也来自历史。继承清朝版图、主张“五族共和”的北京政府和采取劳资协调、安内攘外路线的南京国民政府,都无法过多地依靠排除特定阶级和民族“敌人”以推动国民统合的手法。由于每经革命其象征都会被更改,许多象征都被打上特定时期的历史烙印,故而革命的正当性要求更多地述说其起源,而非“忘却起源”。因此,国家和政党既不能完全垄断象征的解释权,也无法彻底禁止其用于商业活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操作国家象征时一直维持民国初年的“文明”指向,此一做法,较之共产党政权有选择地利用民俗和大众文化,显然缺乏灵活性。

关于近代中国各类象征的个案研究,学界已有丰富积累。但该书以清末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政权的国家象征为研究对象,并将其置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长期变化中予以定位,这一点该领域内其他著作未曾具备,是为本书最突出之处。

本书充分汲取了既有研究成果,通过档案调查等细致的实证研究,详细叙述了近代中国国民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家象征的形成及其继承与转换。且这些叙述着眼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课题,如清末立宪改革及其在民国的继承、为在国际社会确立主权而进行的内政外交尝试、党国体制的确立及近代城市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等。通过如此叙述,本书提示了重新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作整体性检讨的框架。

此外,本书还吸收了西方史及日本史有关象征研究的理论和实证性成果,并结合同期国际社会的状况进行了考察,其明确了近代中国国家象征的特点,从而为深化象征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以下就几点疑问和今后研究的课题作一述论。

著者提到,就有关国族主义的言论来看,中国知识分子比起诉诸情感更热心于理性的说教,且

^① 关于抗日战争以后国民党政权下各纪念日的演变,著者另有如下论文加以考察:「日中戦争期・戦後内戦期国民党政権の記念日政策について」、石川禎浩編『現代中国文化の深層構造』、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5年。

“不指明‘敌人’为何便呼吁统合的国族主义言论,是缺乏魄力与魅力的”^①,在此指出了其在政治动员上存在的消极一面。

但是,如果把知识分子此类“重视理性的倾向”置于近代中国思想史、政治史中重新思考其意义,则如下看法是否也可成立。即这种“理性”在促使民众理解共和的价值,并在为将来实行宪政提供理论根据方面,是否也曾发挥积极作用?

与此相关,如果中国国民整合的重心不在固有传统及民俗,而是首先追求对理念的认同,且近代中国的国家和知识分子一贯保持“文明”指向的话,则此类形式的国民统合和追求文明的方式在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上具有怎样的意义?

比如,一般认为,法国模式的国民统并不以其已然明确的成员为前提,国民资格乃所谓后天获得,故而他们更在意推动民意的集约和统一。^②而中国的传统伦理规范则认为,社会整体的协调比个人自立、意识自由更重要,通过个人修养能够实现与天理合为一体。以“理性”的整合为前提,当凝聚民心的压力与认为个体能与天理融合的伦理规范合而为一时,权力试图统制人们思想的压力,岂非可以获得更加稳固的结构?

当然,国民政府未能具备行使此类强制性统治的能力。但是,更加积极主动地提倡传统和民俗的共产党政权,在向社会渗透此种理念和传统伦理规范的过程中,是否会导致如下结果。即一面对大众要求其进行“触及灵魂的革命”,另一面对各少数民族则以自己负有“使其文明化”责任的意识而待之?

其次,著者认为,近代中国国家象征的制定中未采取积极利用传统和民俗的形式。该评价的对象或不应超出本书所分析的“国家象征”本身。在近代中国,政权正当性理念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共和理念和前卫政党理论,要在这些理念中找出对传统、民俗的积极评价原本就不容易。

但是,无论国民整合的形式如何,任何国民国家都是建立在对一定传统文化和历史记忆的共有这一基础之上的。近代中国的政党和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存亡的危机,对基于成员“自明性”而能从情感方面进行大众动员的传统、民俗的象征及仪式,绝非无动于衷。

在该时期内,下述传统仪式、象征曾发生过重组。孔子祭祀(祀孔)在清末新政时期被改为依明代旧制在仲春、仲秋的上丁日举行,北京政府对此则予以继承。清代的武庙祭祀(祀武)亦被北京政府作为国家追悼仪式的关岳庙祭祀所吸收整合。

此外,在北京政府时期,包括祭孔、祀孔、春节、清明植树节等在内的农历节庆形成了与象征共和的新纪念日并存的另一节假日体系。此外,虽然政府宣扬“五族共和”的理念,但将黄帝塑造为民族象征的进程并未曾停止,儒教国教化的讨论也仍在继续。著者对北京政府的评价——以“文明”指向为基础,在构建国家象征并将其用于民众动员方面都很消极——似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上述仪式、节庆后来在“满洲国”及华北日本占领地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被重新采用,以适应日本统治的需要。^③

本书也论及国民政府的孔诞纪念。但是,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以后又制定有清明节的黄帝祭祀、立春的农民节等农历节庆仪式,黄帝这一象征也为中共所继承。国民政府也曾允许公务员在农历节假日休假,但其实际状况不明之处尚多。此外,国民党也有诸如像编辑了《中华民国生活历》的陈果夫那样,试图建立包括传统节庆在内的国民节假日体系的人。所以,近代中国各政权

① 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庆》,第295页。

② 关于国民统合的分类,请参照谷川稔「国民国家とナショナリズム」,山川出版社(世界史リブレット)、1999年。

③ 丸田孝志「革命の儀礼—中国共産党根拠地の政治動員と民俗」,汲古書院、2013年。

如何依据传统和民俗确立国族主义象征,以试图加强其统治的正统性和正当性,这一问题尚需进一步探究。

民国成立后的各政府,依据国民国家的单一原理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清朝基于中华的天命思想,以及对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宗教、政治权威等多种原理所维持的疆域。本书围绕“五族共和”和“五色旗”问题对由此产生的矛盾作了考察,但并未涉及国民革命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的情形。国民党秉持以汉族为核心同化国内其他各民族而形成中华民族的理念,并以此为前提促进国民整合,因此民族特性无法反映在国家象征之中,其结果,该问题也就被排除在对国家象征自身进行分析的范围之外。但是,以同质化为指向的国家象征在民族整合中起到了何种作用的问题,对思考中国的统一至今仍极其重要。国民党、国民政府在这方面的经验今后仍值得探讨。

另外,直至清代,中央政府都对广阔疆域实行粗放式管理,以此统治方式为前提,地方权力在近代化过程中表现出独立倾向,围绕象征的统一和权力正统性、正当性问题而产生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需要探讨的另一课题。本书在论述辛亥革命、复辟、国民革命时期的国旗等问题时虽然对此有所涉及,但仍需就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国家象征方面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作更深入的考察。本书评者曾就此问题主要对中共根据地和日本占领地区进行过研究。^① 据此,评者认为,通过分析地方权力、社会对国家象征的态度和应对方式,应可进一步明确中国的国家整合问题。

中国社会状况的特点是,阶层间流动性较大,基层社会基于地缘关系形成的共同体性质的规范力量虽然较弱,但依据其当时处境而发展出来的各种战略性网络却发挥着功能。这对国民政府操纵国家象征并以其进行大众动员、推进国民整合的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② 本书的结论似乎是,国民党取得统治权后,较之将这些社会特征用作动员力量,更害怕这种能量失去控制,故而在象征操作方面也更加致力于正规化和制度化。

中共在根据地召开追悼会以及动员群众实施土地改革时,采用了依据这种社会的、人们心性的特征确立其权威的方法。^③ 中共把破坏既有社会秩序以推动革命设为优先课题,而国民党作为统治者须以维持秩序为前提,两者在操作国家象征时出现差异,或许并非偶然。

总之,权力破坏或利用民俗、习惯及社会关系以渗透近代政治意识,而在此过程中社会却常常对象征和仪式进行另外的解读。在充分认识中国社会状况的特征有异于西欧、日本的基础上探究社会与象征的关系,必将进一步丰富有关国民整合、国族主义的研究。

就国家象征的国际影响言之,除美国、法国的共和制外,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象征体系对国民党构建象征体系应有巨大影响,但其许多方面尚不明了。就20世纪30年代的象征操作而言,或还需探讨其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系。此外,留日学生及留日归国者曾如何认识、参考近代日本的象

① 丸田孝志「革命の儀礼」。

② 关于此点,如下研究着眼于日本和中国基层社会结合原理的差异,描述了日中战争至战后国共内战时期总动员体制下的社会变化和变动区别。笹川裕史·奥村哲「戦後の中国社会—日中戦争下の総動員と農村—」,岩波書店,2007年(中文版为林敏、刘世龙、徐跃译:《抗战时期中国的后方社会——战时总动员与农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笹川裕史「中華人民共和国誕生の社会史」,講談社,2011年;奥村哲編「変革期の基層社会—総力戦と中国・日本—」,創土社,2013年。另,高橋伸夫「党と農民—中国農民革命の再検討—」(研文出版,2006年)中指出的中共农村基层组织为各种社会关系所侵蚀的状况,也反映了上述中国基层社会的特质及此种情境下权力掌控社会的具体方式。

③ 丸田孝志「革命の儀礼」。

征操作和仪式,也是值得思考的课题。^①

关于历书,本书虽论及国民政府的《国民历》,但其作为能够体现象征操作特征的媒介,还期待有进一步的研究。关于官历,清末即有将其视作普及国家象征工具的主张,清末至民国时期通书(民间历)亦被注意,从而产生了印制有各种国家象征的历书。通过考察各政权、各时期历书中象征的特点,将可明确近代中国国民整合的各种取向。而且,通书也给我们提供了了解社会曾怎样接受这些象征的线索。^②

本书评所指出的问题或非本书研究范围和著者的意图所在,不少看法亦属强人所难,还请著者海涵。中国的象征研究一般参照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将中共党史纳入探讨对象。但有些研究套用有关象征作用的一般性理解和理论来评介具体政策的“效用”“过失”,而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背景和中国的特殊情况等缺乏关注。此种脱离历史脉络的所谓象征研究,无疑难以呈现和充分发挥该领域研究固有的魅力。最后须强调的是,作为史学专著,本书悉心挖掘史实,直面被置于不同时代状况下的人的主体性选择,同时论述近代中国的象征问题,这使该书兼具了政治史和思想史研究的厚重感。

[作者丸田孝志,日本广岛大学研究生院综合科学研究科教授;译者袁广泉,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郭 阳)

^① 关于20世纪初在东京作为爱国民族主义团体活动的革命派如何参照明治天皇等伟人、名人的写真肖像创制同类风格的黄帝像,请参照石川禎浩「20世紀初頭の中国における『黄帝』熱—排滿・肖像・西方起源説—」、「20世紀研究」第3号、2002年。与小野寺著作一样,该文也采用历史分析方法来解读创制象征的时代脉络。

^② 关于清末至民国历书的改编、演变,请参阅如下研究:1) チャード・J・スミス著、三浦國雄監訳、加藤千恵訳『通書の世界—中国人の日選び—』、凱風社、1998年;遊佐徹『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時間・空間・表象』、岡山大学文学部研究叢書、2012年;丸田孝志「満州国『時憲書』と通書—伝統・民俗・象徴の再編と変容」、『アジア社会文化研究』第14号、2013年;丸田孝志「中華民国期の通書に見る時間と象徴」、『アジア社会文化研究』第15号、2014年。